

敦煌书法综论

沈乐平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言破无明一照真俗开
发百年时流至一千後故
有執時除惑一者无常故
論並以百聖依隨而行无



沈乐平 著

敦煌书法综论

穆遂之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书法综论 / 沈乐平 著.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715-487-7

I. 敦… II. 沈… III. 敦煌学 — 书法 — 研究 IV.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864 号

敦煌书法综论

沈乐平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责任编辑 朱艳萍 杨少锋
封面设计 刘 欣
制 版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487-7
定 价 40.00元
网 址 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旧同学沈乐平博士，在中国美院读完本科、硕士，到攻读博士学位，是以中国美院的书法专业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学历，见称于书法界的青年一代书家群中。

中国美院在当代书法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毋庸多言。一方面，它是正宗的大学本科教育实践的开创之地，另一方面，它又最具系统性、体系化特征，并且是以强调自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以来的关注经典、从古典入手的“正脉”。中国美院许江院长在我的“线条之舞”书法展中特别提出一个“一枝五叶”的概念，这是从佛家禅语的“一花五叶”中蜕化而出的，但细细品味起来，一“花”是结果，是完成；而一“枝”却是主干，还可以生长出无数的“花”“叶”，因此这一改动，实在是体察细腻、精准得很。沈乐平在这“一枝五叶”的肥沃滋养下，从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到刘江、章祖安；再到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和我这代，完成了“五叶”的布局。再到其后的千花万叶，如成百位书法专业本科专业生、上千位进修生，以及每一届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这样来看沈乐平和他这一代青年书法家，或许会比单纯看他一个人的成果更见透彻与清晰。

沈乐平在美院读书法本科时，我即是带班的班主任老师。这个本科，我以为很重要：因为它是奠定一个人的书法基础技法与书法认知能力的重要一环。按

我们现在的说法，叫“童子功”。有没有这个“童子功”是大不一样的。许多在北大读博士的才子，却因为本科不是在北大读而要平白添出相当的压力，常常被质疑基础能力与水平，看起来好像是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大有过于讲究出身门第的准学阀思想，但我经历过 30 年的书法教学实践，慢慢悟到北大的这种“貌似偏见”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一旦本科在北大读，其环境熏染、其学术认知能力、其学科定位高度和专业使命感，乃至大学教授的每天授课，耳濡目染，都会在四年间对一个大学生形成天差地别的影响与塑造。许多在普通学校被认为是挑剔与苛求的，在北大即被视为正常而坦然接受，时间一长，学术意识当然就有霄壤之别了。故现在闻许多大学招聘教师，除看有无博士学位（应聘者人人皆有之），更看是哪个大学本科毕业的。以此来看沈乐平他们的这班同学，其优势自不待言。

当然，美院每年毕业那么多本科生，许多走上社会就业，许多改行了……并不是本科有个好出身就一定万事大吉，本科毕业之后在专业上不努力而平平庸庸的也多得很。从硕士读到博士，沈乐平付出了比常人艰难得多的时间、精力与心血。细算起来，从 1993 年入中国美院读书法专业本科至今，已是 16 年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本科毕业时，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五代书法史”。当时的史料排比做得很细，很有些新意。但在答辩时却遇到个别教师的不理解，认为“五代”不是经典辈出的时代，不值得作为论文选题。但其实，正是这样的在一个大家都不赞成的领域中花费大量心血，做深做透，才见出一个学者的功力与眼光。沈乐平的本科毕业论文其实毋须如此高要求，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已足够应付过关，但正是这样的水平已接近硕士学位论文的学术能力，使我对他的研究素质刮目相看。

沈乐平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敦煌书法题材。关于敦煌书法，迄今为止，个案研究的内容着实不少，许多精致的考订，都做得非常有特点。在构建“敦煌学”的书法一翼方面，已有相当的水准。但从一个特定的敦煌书法史立场出发，对它进行大历史的观照，却还缺乏相当的成果。鉴于此，沈乐平在叙述了敦煌那些耳

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以后，迅速进入到敦煌现存书法的“断代”、笔法与风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并划出了北魏、北周、隋与初唐、盛中唐直到晚唐五代及北宋的各个时期的敦煌书法特征，以此为纵线，再作“横向”的思辨展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如“写经体”、“俗字”、“篆书千文”、“古美术字”等。此后，对几种著名的敦煌临本如《十七帖》临本、《兰亭序》临本、《真草千文》临本以及《温泉铭》等等，进行了个案研究，以此来对敦煌书法的作品进行较全面的解读。其后又涉及到敦煌文书中的用印、笔墨、纸张，乃至书法传授、书论校勘，最后，以“民间性”、“时代性”、“地域性”三方面作一论定，就我的管见而言，对敦煌出土文书作纯粹书法意义上的解读而不是将书法依附于文献学视角，这应该是写得较成功的一部博士论文。此外，看了这部论文，我又想起他在读本科时的毕业论文是写五代书法，也是一个截面与脉络的全面梳理。应该说，这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沈乐平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当然要经受的“磨难”与考验也必然会很多。如果能咬紧牙关努力攀登，他会是一块很好的学术材料。但他兴趣太广泛，有时不免会转移过快过多，所谓有其才但却乏其志，这是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亟需认真思考并加以注意的。我衷心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有出类拔萃、脱颖而出者，希望他能不负众望，成为他这一代人的佼佼者。目前书法界不缺大众投入，缺少的恰恰是精英的引领与以身作则。以此来要求这些有幸从事专业学习者，应该不会过分吧？

陳振濂

目 录

目
录

序 /1

中文摘要 /4

凡例 /5

引言 /7

第一章 概述 /9

一、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原因 /11

二、藏经洞之发现——王圆箊的功过是非 /15

三、遗书的流散与去向：1905—1925/21

第二章 敦煌书法断代发凡：笔法递变与风格发展的分期 /27

一、十六国时期的敦煌书法（304—442）/27

二、北魏和西魏时期的敦煌书法（442—557）/33

三、北周时期的敦煌书法（557—581）/41

四、隋代的敦煌书法（581—617）/42

- 五、初唐时期的敦煌书法（618—705）/46
- 六、盛唐及中唐吐蕃时期的敦煌书法（705—848）/50
- 七、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书法（848—914）/53
- 八、五代及北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书法（914—1036）/54

第三章 书体解析——对形式要素的梳理 /59

- 一、论“写经体”/59
- 二、论《篆书千字文》/72
- 三、论行草书的源流与传承/76
- 四、论“俗字”/91
- 五、论硬笔书法、古美术字及其他/103

第四章 名作的流传及其影响 /107

- 一、《十七帖》临本的意义：从 P.4642 到 S.3753/107
- 二、《兰亭序》临本批评：以 P.2544、P.3194、P.2622 为中心/112
- 三、蒋善进：P.3561《真草千字文》/115
- 四、P.4510 + S.5791《化度寺碑》拓本校读劄记/118
- 五、P.4508《温泉铭》与 P.4503《金刚经》/125

第五章 关于敦煌文书的使用工具材料之考察 /131

- 一、笔墨的演化与发展/132
- 二、纸张的分类与断代/141

第六章 敦煌书法用印概说及印例索引 /154

- 一、关于“永兴郡印”/155
- 二、铃盖印鉴解说/157
- 三、敦煌遗书铃用印章列表/171
- 四、补述/176

第七章 敦煌写本中的书史书论资料与敦煌的书法教育 /178

- 一、从 P.4936《笔势论》谈古代书论的校勘/178

二、从 P.2555《怀素师草书歌》谈史料之补证 /186

三、敦煌书法教育的两个层次 /190

第八章 综述——对敦煌书法的立体阅读 /197

一、从“民间性”的角度审视 /197

二、从“时代性”的角度审视 /202

三、从“地域性”的角度审视 /205

四、与楼兰文书和高昌文书的对比 /208

五、书法史学和书法文献学的交汇 /215

附录一 参考文献 /219

附录二 敦煌文书鉴藏印章检索表 /224

附录三 相关碑刻铭文参考表 /243

后记 /245

【中文摘要】

▲ 自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令人叹为观止的总数达五万余件各种形式的书法墨迹、碑刻拓本方公之于世，敦煌遗书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清代内阁档案被学界并称为近代中国的“四大学术发现”。

▲ 站在书法史的角度，敦煌文书所跨越的七百年间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文字衍进和审美趋向等因素综合地决定着书法风格的变迁、融合以及笔法技巧的演化和发展。如此众多、如此集中而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真实而全面地为我们展示着这条脉络。

▲ 敦煌文书的出土对于研究晋末至宋初这个阶段的书体衍变和风格传承等诸多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文书中比例最大的部分当属各类经文和书仪，其间展示出一条完整的写经体的衍化轨迹，又如数件王羲之书法的临本、唐代刻碑拓本以及有关于书法理论的残卷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书法学文献。

▲ 敦煌写本各体皆备、风格多样、形式各异，但又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自然、淳朴的审美情趣，它既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着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又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凡 例

一、文中所引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均用公认之定名简称，如“BD.”（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P.”（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劫经部分）、“S.”（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劫经部分）、“Д x./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本）、“敦研”（敦煌研究院藏本）、“敦博”（敦煌博物馆藏本）、“浙博”（浙江省博物馆藏本）、“浙图”（浙江省图书馆藏本）、“津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本）、“北大”（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甘图”（甘肃省图书馆藏本）、“甘博”（甘肃省博物馆藏本）、“故宫故/故宫新”（故宫博物院 1949 年前旧藏/1949 年后新藏），以及专用前缀如“TAM./TKM.”（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出土品）等。

二、尾缀“a”、“b”、“c”及“(1)”、“(2)”、“(3)”等表示此件包括几种不同内容的写本残片。尾缀“v”、“背”表示写卷背面之书写内容。

三、涉及历史纪年，凡旧纪年者皆括注公元纪年，省略“公元”、“年”字样，民国开始皆按公元纪年。

四、外国人名、著作、机构等，酌注原文。古今地名，酌注今名。

五、重要人名、作品、著作等，加以脚注，一般略去。

六、词目名称一般以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为准。

七、文本标题一般依照《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及《新编》。

八、正俗字之界定以《干禄字书》和《正名要录》为准。

九、录文中凡缺字以“□”示，残缺或可辨者字外加以“□”示，补字及错字衍文则随文加注以“()”订正。

十、脚注中常引之文献如《历代书法论文选》等，则略去出版社名称及版次年代，只列书目和页码，具体请一并参见文末附录“参考文献”部分。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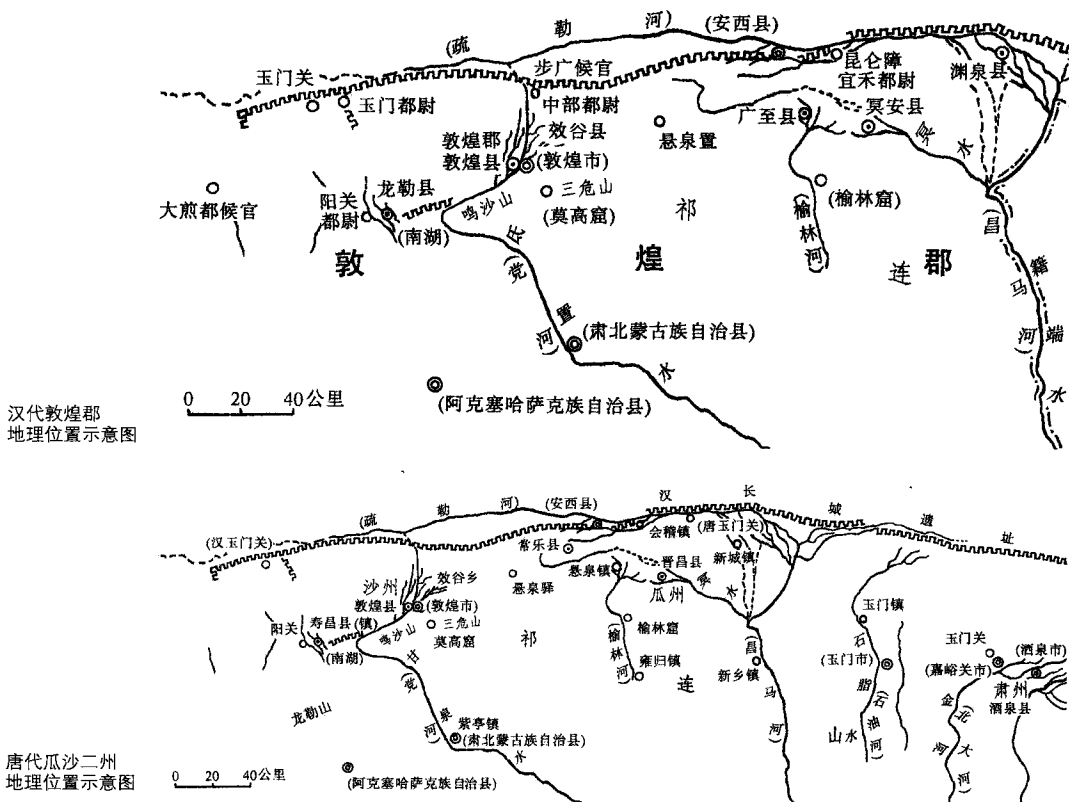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①陈之所指，针对的即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随着20世纪敦煌学的迅猛发展、相关研究工作的不断细化深化以及英法日俄诸国所藏资料陆续大量公布，“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②。从我们书法史学和书法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这一系之内容也逐渐成为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无论在理论研究领域的探讨和考证，还是在创作实践方面的参考和汲取。

敦煌遗书，最早的可追溯到4世纪，最晚的一件则是北宋初咸平五年（1002）七月十五日的Φ.32a《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其间跨越了整整七个世纪，且十年以上的空白期是极少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间断式的进程痕迹；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由隶到楷的转化、演变、固定期，敦煌出土的近六万件汉文墨迹文书^③便成为这一段书法发展的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①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3页。

②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 据方广铝《敦煌遗书编目所用数据库及数据资料》一文：“汉文遗书大约有58000号，分布如下：1. 英国图书馆，约14000号；2. 法国图书馆，约4000号；3. 中国国家图书馆，约16000号；4.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19000号；5. 日本散藏，约2000号；6. 中国散藏，约3000号；7. 西欧、北美及其他地方散藏，约数百号。”《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我们试从书法学的视角出发，按照文献学研究之基本方法，以史学考察为纵线、以美学分析为横线的框架，来归纳、梳理、分析、研究4—11世纪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断代分期及相应的笔法衍变和风格归类，敦煌文书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正史”之间的影响与互动，笔墨纸张材料的变迁对书法的推进作用，各类印鉴的铃盖和使用状况，以及书史、书论和书法教育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从而在理论结构上对“敦煌书法”这个专题，初建一个书法形态下的较为完整的学术系统，对晋末南北朝时期直至宋初的书法史做一些简明而必要的补充工作。

“回顾百年来敦煌学的发展，它的本质可以说是一门以文献材料为核心的新兴学科”^①，正因文书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又有相当部分流失海外，故本文在撰写中主要选取在书法意义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特殊性的写本等文献作为范例和对象，以此来展开。

^① 朱凤玉、郑阿财《潘重规先生敦煌文学研究成果与方法之考察》，《敦煌学》2004年第25辑，第1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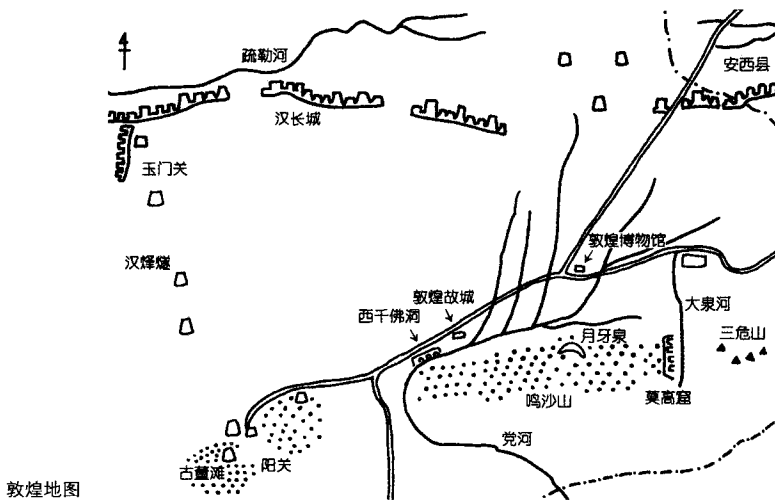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概述

“华戎所交，一都会也。”^①

历史上的敦煌，向来就是古代中原入西域之门户，也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处便有文字记载了，那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秦汉之际则是被匈奴所控制。及汉元狩二年（前 121），设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 111）又分设张掖、敦煌二郡^②。同时，汉朝又将长城从酒泉西移至敦煌郡城西侧，并设玉门关和阳关，这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谓之“列四郡、据两关”者。东汉永和二年（137）所立《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纪功碑》（清初出土），足以证明当时的敦煌已具备了地区之军政中心的地位。

① 《后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刘昭注引《耆旧记》。

② 敦煌郡是从酒泉郡中划分出来的，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见《汉书·武帝本纪》、《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



汉末战乱频仍，而作为中西交通之要冲的敦煌亦是常年无太守，管理失位，秩序混乱，直到三国魏太和元年（227）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才控制了局面^①，他施政有力，使这里成为了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密切交往的一个国际都会。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大乱，大批士族文人迁居河西以避战祸，此处便集中了大量人才，使得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达到了与中原相埒的程度。尤其是前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和保护，并且在政治上也为他们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等行为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晋书·宋纤传》就提到宋氏受业弟子逾三千，规模不小，祁嘉也是“教授门生百余人”。《史通》卷一八中载盛唐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在阅读《敦煌实录》后慨叹此处“磊落英才，粲然盈瞩”。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讲到的宋纤、宋繇、郭瑀、刘昉、张湛、阚骅等一批著名学者，其文其言还曾陆续传入南朝。所以，在中原士族迁来的同时，也势必把内地文化传入敦煌。

而佛教早在两汉之际，便由大月氏的贵霜经敦煌传入中土，到了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当地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连年战乱动荡的影响，便迅速传播开来。检《高僧传》，载有被称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的竺法乘等译经布道的众多僧人^②。再有即是乐僔、法良开凿洞窟，创造了一段延续近千年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这种尊佛的风气到了北魏，进一步结合中原的佛教文化，发展势头愈加迅猛。此外，东阳王元荣、建平公于义等人任瓜州刺史期间，组织人员大量

① 《三国志·魏志》。

② 竺法护（231—308），月氏人，世居敦煌，译有佛经159部，是佛教入华以后译经最多的一位高僧，见《高僧传》卷一《晋长安县摩罗刹传》。竺法乘，见《高僧传》卷七《晋敦煌竺法乘传》。

抄写佛经、开凿大窟，政府官员和王公贵族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表率作用，上行下效，佛教在民众中的基础便更为广泛、牢固了。隋唐二代亦同样推崇佛教，彼时之敦煌，已是丝路上一个至为重要的国际文化都会了，即便是在被吐蕃占领期间，统治者仍是大力弘扬佛教，而与吐蕃签订“勿徙他境”的盟誓也使得敦煌保存了人力物力，传统汉文化得以延续。遗书中的佛教写经之比例占到近九成，其传播力和影响度可见一斑。

张氏归义军政权成立后，极力恢复李唐的各项制度，加强汉文化教育，促进中西文化交往。但因10世纪中叶以降，宋王朝先后与辽、夏、金等政权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影响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而西夏在占领瓜沙二州后又征发百姓攻宋，更令此地日趋衰败没落。南宋建都杭州后，客观上又使得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进一步南移，所以，敦煌在逐渐失去了这种重要地理位置的同时，其文化、艺术等方面也相应地衰退下去了。

一、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原因

藏经洞，即今莫高窟第17窟，一个位于16窟甬道北壁的并不起眼的洞窟，因在鸣沙山，又称“鸣沙石室”。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其原因，一直以来未有直接而确凿的原始资料，众说纷纭。但主要的意见有几种，现详述如次：

1. 封闭于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之前

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法国人伯希和^①，他于1908年写的《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到：“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

①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汉学家。在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河内）期间，曾数次赴中国为该院购买中国古籍；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 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又将藏经洞遗物全部精选后，购得大量藏经洞文献及绢画。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1909年，伯希和将部分敦煌写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中国学术界始知敦煌遗书。伯氏曾编制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罗福苙译载《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第8卷1期；伯氏又将其所摄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